

## 治理研究

**主持人语:**本期“乡村振兴专栏”发表的三篇论文,涉及农村劳动力外流、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乡村文化复兴等乡村振兴的重要议题,反映了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前沿学术探索。《劳动力外流、农村集体行动与乡村振兴》一文探讨劳动力外流对于农村集体行动的复杂影响机制,揭示劳动力外流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政策调节来缓解甚至扭转,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诠释和政策启示。《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一文从土地产权视角分析乡村治理转型,指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内的农地确权改革,推动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走向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乡村治理。《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基于浙江省诸暨市的案例分析》一文认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是乡村共同体重建,通过人才回流、组织重建、活动重聚、空间再造和价值文化重构,可以实现乡村文化复兴进而带动乡村整体的振兴。三篇论文都是从基础理论层面透视当代中国农村发展与治理问题,呈现了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和文化变迁的深层逻辑,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和可行路径。

史志钦(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

# 劳动力外流、农村集体行动与乡村振兴

王亚华 苏毅清 舒全峰

**摘要:**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因大规模劳动力外流所导致的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问题。基于国际集体行动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以农村灌溉集体行动为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深层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经由抽离村庄领导力、破坏村民积累社会资本、削弱农民的村庄归属感,以及降低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中介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产生综合性负面影响;但是,劳动力外流对村庄的领导力、村民间的社会资本、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以及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理论上可以通过政策调节来缓解甚至扭转。研究结论为制定乡村振兴的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 集体行动; 劳动力外流; 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中国公共政策理论与治理机制研究”(71721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农村集体行动机制与公共事务治理”(71573151);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双高”计划专项(2021TSG08204)

**作者简介:**王亚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北京 100084);苏毅清,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宁 530004);舒全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 一、引言

乡村衰落是个全球性的难题,缘起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引发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从1960年至2016年的半个多世纪里,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农村人口分别减少了73%、44%、18%和47%(Liu和Li,2018:275-277)。以中国为例,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高达2.86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比例为21.8%。中国农村的外出务工者,绝大多数是村里有生产经营能力、有开拓精神或年轻力壮的农民,他们既是村庄建设的主力军,也是乡土文化与传统的继承者。随着这些年轻劳动力相继离开村庄,以乡土社会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空心化、老龄化和非农化等现象在农村日益严重,导致中国部分地区在城市

化突飞猛进的同时乡村却逐渐走向衰落: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因缺乏高质量的劳动力而导致出现生产性衰落(叶兴庆,2018:65—73);城乡教育差距持续扩大、传统乡土文化和社会资本日趋淡薄,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和农村,造成各种生产性要素从农村加速逃离,带来更具挑战性的社会性衰落(朱启臻,2018:21—27);在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型权力弱化和公共资源产权碎片化现象日益突出,导致农村的基层治理陷入了“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并存的困局,形成了制度性衰落(王亚华等,2016:23—30)。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的新国家战略,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这是对中国正面临的乡村衰落挑战的及时响应。中国部分农村地区面临的乡村衰落,特别是社会性衰落和制度性衰落,其本质是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普遍下降,它是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生产生活凋敝、乡土文化式微、自组织能力低下、村民合作困难、管理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大规模劳动力外流所导致的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难题。本文将利用 CIRS 农村调查数据和田野调查案例探索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内在机制,尝试系统揭示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进而为促进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政策启示。

鉴于灌溉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工程,是农村典型的公共事务,其涉及农村中不同区域间的相互协调,需要组织民众广泛参与,并进行持之以恒的管理,其管理过程体现为如何有效地组织起灌溉集体行动的过程(Ostrom 和 Gardner,1993:93—112;Ostrom,1999:278—282;Cox,2014:213—222)。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水资源最紧缺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 2 240m<sup>3</sup>,特定的自然条件决定了灌溉这项公共事务自古以来都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本文的实证部分将以灌溉集体行动为研究对象。

## 二、机制与理论假说

集体行动是公共事务治理的核心内容,而乡村衰落的实质恰恰是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农村集体行动的形成源于人们需要对农村中的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就共同面对的行动问题(比如灌溉问题)进行协商,并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实现公共品供给(如渠道维护),来增进共同利益(Olson,2017;Ostrom,1990)。本文借鉴国际集体行动理论的最新成果,探寻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的具体机制,并建立理论分析框架。

### (一)集体行动与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关于如何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国际学术界已经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先后发展出了三代集体行动理论(Ararat 和 Ostrom,2014:11—23)。本研究主要基于第二代集体行动理论的成果进行理论建构。第二代集体行动理论的突出成果是对集体行动的系统诊断框架的开发(Ostrom,2007:15181—15187)。目前,用于系统诊断人类集体行动的常用分析框架是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IAD)框架和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S)框架。IAD 框架和 SES 框架提供了一种研究复杂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性方法(Ostrom,2009:419—422)。本文选择 SES 框架来构建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理论,图 1 呈现了 SES 框架的内部结构(Mcginnis 和 Ostrom,2014:33)。将劳动力外流归为代表宏观环境中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变量,即将劳动力外流视为宏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外部冲击。而寻找这种外部冲击所引起的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的具体机制,则需要对社会生态系统进行更精确的描述和更细致的分解。表 1 所示为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生态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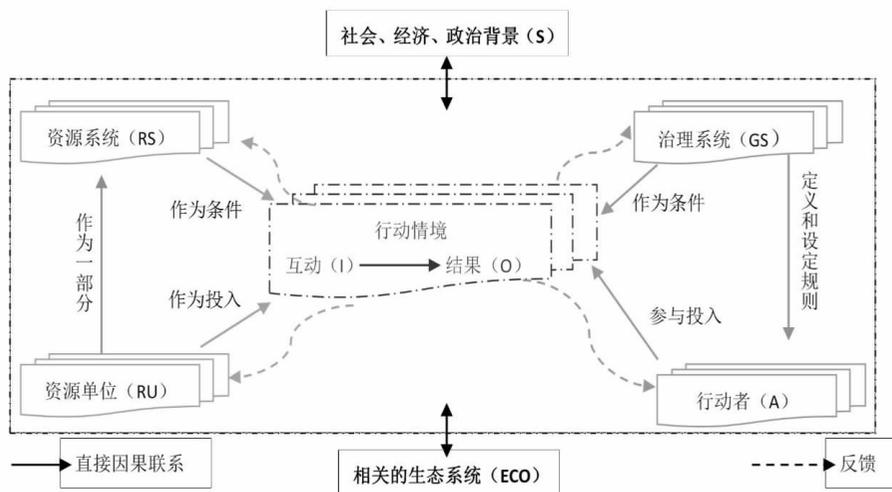


图 1 社会生态系统 (SES) 框架第一层级变量及其关系示意图

表 1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生态系统

第一层级变量	第二层级变量
社会、经济、政治背景(S)	S2 - 人口趋势 S2 - a 劳动力外流
资源系统(RS)	无变化
治理系统(GS)	无变化
资源单位(RU)	无变化
行动者(A)	A1 - 相关行动者数量 A2 - 行动者的社会经济属性 A2 - a 村民间的异质性 A3 - A4 - A5 - 行动者的领导力/企业家精神 A5 - a 创新与规划能力 A5 - b 榜样与示范作用 A5 - c 组织与动员能力 A6 - 社会规范/社会资本 A6 - a 社会资本 A6 - a - 1 信任 A6 - a - 2 关系网络 A6 - a - 3 行为规范 A6 - b 村庄归属感 A6 - b - 1 身份感 A6 - b - 2 奉献感 A6 - b - 3 认同感 A7 - A8 - 资源的依赖性 A9 -
行动情境:互动(I)→ 结果(O)	I5 - 投资活动 I5 - a 参与灌溉设施筹建和修缮的积极性 O1 - 社会绩效测量 O1 - a 灌溉集体行动的成败
相关的生态系统(ECO)	无变化

可分解性(Decomposition)是SES框架的特点之一。遵循制度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原则,SES框架的可分解性为研究不同情境下的集体行动问题提供了理论线索。如表1所示,劳动力外流对SES系统中的子系统或具体变量的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1)劳动力外流将显著减少资源使用者数量;(2)劳动力外流将显著影响村庄的领导水平,尤其表现为对行动者在创新与规划能力、榜样与示范作用、组织与动员能力等方面的影响;(3)劳动力外流将显著影响村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尤其表现为对人们之间信任程度、关系网络紧密度和行为规范执行度的影响;(4)劳动力外流将显著影响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尤其表现为人们对村庄的身份感、奉献感和认同感等方面的影响;(5)劳动力外流将显著影响人们对于农业资源的依赖性;(6)劳动力外流将显著影响村民之间的异质性。由于劳动力外流对于农村社会生态系统的以上影响,将使得村民对于公共治理的投资意愿发生变化,如参与灌溉设施筹建和修缮的积极性产生变化,由此导致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变化,进而对农村社会和乡村治理产生深刻影响。

## (二)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机制

Wang等(2016)与苏毅清等(2020:185—197)的研究证明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存在负向影响,但是并未全面揭示这一因果效应背后的机制,本文旨在对这一影响机制作进一步探究。基于表1所示的SES框架的分析,本文认为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主要源自劳动力外流通过五方面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所产生影响。本文以灌溉集体行动为例,结合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CIRS)2016年的村庄访谈资料、实地调查数据与理论文献,阐释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五种可能机制。<sup>①</sup>

### 1. 机制一:劳动力外流→领导力→集体行动

领导力是形成集体行动的关键变量(Meinzen-Dick等,2002:649—666)。按照公共领导力衡量指标的经典分类:以身作则、共启远景、使众人行、激励人心、挑战创新(库泽斯,2007),本研究将领导力进一步归纳为创新与规划能力、榜样与示范作用和组织与动员能力三个方面。当一个品德高尚的或值得信任的个体加入集体行动时,集体的沟通成本和组织成本将会下降,其他人在这个人的影响下将更乐意加入集体行动(Kolavalli,1995:1933—1938)。对印度灌溉系统进行的研究表明,大学毕业生和地方长老所表现出的领导力,对当地灌溉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即集体行动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Meinzen-Dick,2007:15200—15205)。

劳动力外流带走了很多在农村治理中发挥组织与协调作用的精英人才,同时加剧了农村的老龄化,降低了村庄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从而对农村集体行动产生了负面影响。CIRS的村庄调查中发现,劳动力外流导致了村庄内领导力的急速流失,使得村庄内的集体行动难以开展。在河南省的YG村,劳动力外流几乎抽离了村庄中所有有能力组织集体行动的领导人才。虽然村里也有个别能人能够主持修路等公共事务,但在集体灌溉的组织、集体灌溉设备的筹建和维护方面却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创新与规划能力的缺乏,以及组织与动员能力的不足。河南省的WZ村与YG村的情况类似,而江西省的HN村和河南省的YL村在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领导力流失。上述受调查村庄的灌溉集体行动并不成功,由此可见,劳动力外流可能会引发村庄领导力的流失,进而导致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 2. 机制二:劳动力外流→社会资本→集体行动

社会资本是影响集体行动的重要变量(Bardhan,1993:87—92;Stern等,2005:336—346)。社会资本可从信任程度、关系网络和行为规范的执行三个层面进行考察(Putnam等,1994)。社会资本会

<sup>①</sup> 本部分所引用的村庄案例,均来自2016年7月—9月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组织的全国性农村调研。其中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贤春、高瑞,清华大学水利系的王慧杰、刘中祥、王帅奇,清华大学新闻系的马姚姚以及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张明慧,主要参与了本文所引案例的访谈与整理。

影响成员投身于集体行动的信心,即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成员之间对彼此参加集体行动的信心越足,于是集体行动就更容易形成(Pretty,2003:1912)。具体到农田水利方面,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灌溉集体行动能力越强(Li和Li,2011:391-405)。

CIRS的村庄调查中发现,大规模的劳动力外流削弱了村民所积累的社会资本,进而对农村的集体行动能力产生影响。在江西省的LT村,村民大量外出务工使得村民之间的关系逐渐松散,人们相互间的信任程度出现下降,造成该村的公共事务很难协调,许多村民不得不放弃集体灌溉,转向打井或抽水的个体方式来解决灌溉需求。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江西省的HN村。此外,河南省的YL村、YG村和WZ村,在村庄劳动力大规模外流的影响下,则集中体现了村民间关系网络破碎的现象。上述受调查村庄的灌溉集体行动均不成功,由此可见,劳动力外流可能会削弱村民所积累的社会资本,进而导致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 3. 机制三:劳动力外流→村庄归属感→集体行动

社区归属感(sense of community)是形成集体行动的催化剂(Mannarini和Fedi,2009:211-227;Klandermans,2014:887-900;Chavis和Abraham,1990:55-81)。人们对社区归属感的定义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身份感,即居民是否感觉自己属于这个社区,愿意长久居住并且承认自己是其社区的居民;其二,认同感,即居民是否对社区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并认为这些事情同自己息息相关;其三,留恋感,即当居民要迁出社区时,是否会对该社区感到留恋和依依不舍;其四,奉献感,即居民是否愿意为社区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Kasarda和Janowitz,1974:328-339)。村庄归属感的增强能够促进村民参与村庄集体行动(Cicognani等,2008:97-112)。

CIRS的村庄调查发现,在HN村、LT村以及WZ村,村民们虽然认可自己作为村庄村民的身份,觉得村庄的事务与自身息息相关,但是并不会因此而感到荣幸或者自信,也不愿意长久在村庄居住。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已不太愿意为村庄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劳动力外流引发了村民对于村庄归属感的大幅降低,即村民常说“渐渐的没了乡愁”,这也会导致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 4. 机制四:劳动力外流→资源依赖性→集体行动

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越高,人们越容易形成集体行动;而对资源依赖程度的降低会削弱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Ostrom,2000:172-213)。目前,全国农户的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已经不到20%,农户对农业的依赖性降低会导致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意愿下降。

CIRS的村庄调查发现,在江西省HN村,由于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多,农民的务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务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份额逐渐减少,导致农户对于村庄灌溉集体行动的依赖性降低。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部分的受调查村庄中。由此可见,劳动力外流可能会降低村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程度,进而导致农村的集体行动能力下降。

### 5. 机制五:劳动力外流→村民间经济异质性→集体行动

经济社会异质性也会成为影响集体行动成败的关键变量(Adhikari和Lovett,2006:426-445;Stiglitz,2012;Janssen和Anderies,2013:427-447)。农户家庭收入和社会文化特征的异质性增强,会导致村民对农村公共事务的需求出现分化,增加集体行动的难度。在印度,随着农户耕地数量的异质性降低,参与集体灌溉组织的农户数量随之增加,灌溉集体行动由此也越容易达成(Easter和Palanisami,1986)。在中国,村民异质性的增加,可能是导致小微水利遍地开花的重要原因(苏毅清等,2020:185-197)。

CIRS的村庄调查发现,在劳动力不断外流的影响下,近年来河南省WZ村的村民之间收入差距明显拉大,经济条件好的农户更不乐意参加集体灌溉设施的修建和维护,很多农户选择了打井或自购提水设施解决自家灌溉需求。由此可见,劳动力外流有可能会加剧村民间的异质性,进而导致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以上是劳动力外流可能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五种机制,所提供的例证均为没有成功达成集体行动的村庄。在 CIRS 的村庄调查中,也观察到了一些在灌溉集体行动方面,相对比较成功的村庄,可为上述假设机制提供进一步佐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ST 村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外流程度较低的村庄,由于劳动力外流程度较低,上述各项影响灌溉集体行动的因素并没有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所以上述五种机制未见实现触发,该村的集体灌溉方式总体保持良好。湖南省 SX 村是为数不多的在村庄存在大规模劳动外流的情况下,集体灌溉还能运作良好的村庄。究其原因,一方面,SX 村的村支书因为有大学生村官经历,是县里重点培养的基层骨干。因此在上级部门的培养和支持下,该村支书对村里的公共事务展现出很好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创新规划能力。另一方面,SX 村是其所在县保存完好的侗寨之一,在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氛围下,村民之间信任度高,人与人之间互相分享着“感情深,家乡是唯一的根”的朴实观念。因此,优秀的领导力、良好的社会资本和村民归属感,使 SX 村一直能维系集体渠灌方式,对灌溉设施的筹建和修缮等活动能够顺利进行。SX 村的案例说明,若能够通过有效的方式,避免一些关键影响变量朝着不利方向发展,就有可能扭转劳动力外流带来的不利趋势,维持农村的集体行动能力,避免乡村衰落的命运。

表 2 总结了上述 7 个 CIRS 调查村庄在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下,领导力、社会资本、村庄归属感、资源依赖性、村民间异质性之间的变化与村庄灌溉集体行动之间的直观关系。

表 2 劳动力外流引发的关键因素的变化情况

灌溉集体行动是否成功	HN 村 否	LT 村 否	YL 村 否	YG 村 否	WZ 村 否	SX 村 是	WL 村 是
社会、经济、政治背景(S)							
劳动力外流(S2-a)	45.16%	40.00%	51.72%	86.21%	44.44%	56.5%	6.67%
行动者(A)							
领导力(A5)							
创新与规划能力(A5-a)	↓	—	—	↓	↓	↑	—
榜样与示范作用(A5-b)	—	↓	↓	↓	↓	↑	—
组织与动员能力(A5-c)	↓	—	↓	↓	↓	↑	—
社会资本(A6-a)							
信任(A6-a-1)	↓	↓	—	—	—	↑	—
关系网络(A6-a-2)	↓	↓	↓	↓	↓	↑	—
行为规范(A6-a-3)	—	—	—	—	—	↑	—
村庄归属感(A6-b)							
身份感(A6-b-1)	↓	↓	—	—	↓	↑	—
奉献感(A6-b-1)	↓	↓	—	—	↓	↑	↓
认同感(A6-b-2)	—	—	—	—	—	↑	—
资源依赖性(A8)	↓	↓	↓	↓	↓		—
村民间异质性(A2-a)	—	↑	—	↑	↑	—	↑

注:1. 劳动力外流程度用外出务工人员占村庄劳动力比例表示;2. “—”表示调查中没有相关情况的反馈。

### (三) 理论假说

综上所述,劳动力外流对农村集体行动的可能影响机制,可以表述为以下 6 个理论假说:

首先,劳动力外流存在对农村集体行动的负面总效应:

H1: 劳动力外流将降低农村的集体行动能力。

其次,若劳动力外流与农村集体行动之间的总效应存在,则有进一步的假说:

H2: 劳动力外流造成了村庄领导力的流失,进而导致了农村的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H3:劳动力外流削弱了村民积累的社会资本,进而导致了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H4:劳动力外流淡化了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进而导致了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H5:劳动力外流降低了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进而导致了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H6:劳动力外流加剧了村民间的异质性,进而导致了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通过实证分析对以上假说进行检验。

###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估计模型的构建

#### (一)数据来源

CIRS 于 2017 年暑期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农村问卷调查。此次调查的内容涵盖了农户与村庄基本状况、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土地宅基地与房屋、农田水利与灌溉、农村信贷保险、新产业新业态与返乡就业创业、村庄治理与参与、贫困与脱贫,以及教育、医疗、养老情况等九大方面。各调研支队对选定村庄的村干部进行访谈,并在村庄内抽取约 25 个农户进行详细的问卷调查,最终共计共回收村庄问卷 865 份,农户问卷 17 949 份。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在将数据进行清理,并将村和户两级问卷进行精确匹配后,本文可以使用的有效样本为来自 20 个省份的 480 个村庄的 3 764 个农户观测值。

#### (二)因变量与核心自变量

因变量选取方面,文献中衡量灌溉集体行动的主要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产出法,即用集体行动的结果来测量集体行动,例如,用灌溉设施的维护状况来度量集体行动的成效(Bardhan, 2001)。另一种是过程法,即用集体行动的过程来测量集体行动,例如用成功组织的集体活动的数量(如集体游说、渠道的维护)来度量集体行动的成效(Fujiie 等, 2005: 179 - 189)。本文根据过程法选取“农户参与灌溉设施筹建与修缮的频率”作为衡量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因变量。

核心自变量选取方面,本文选用“村庄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占村庄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作为核心自变量(Wang 等, 2016: 79 - 93)。

#### (三)中介变量

##### 1. 领导力

村庄的领导力是一个不易被观察到的潜变量。衡量领导力潜变量的 13 个观测变量均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对村民开展主观评价调查,<sup>①</sup>经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这 13 个观测变量均属于同一个维度下的变量。

##### 2.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一个潜变量。基于“劳动力→社会资本→集体行动”的机制逻辑,以及社会资本组成的定义,经探索性因子分析,选用信任、关系网络和行为规范两个维度来反映村民的社会资本积累情况。

##### 3. 村庄归属感

村庄归属感是一个潜变量。基于“劳动力→村庄归属感→集体行动”的机制逻辑,根据人们对社区归属感的定义,经探索性因子分析,本文选用身份感与奉献感,以及认同感两个维度来反映受访村民的村庄归属感情况。

##### 4. 资源的依赖性

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在本次调查中被列为一个比较容易被观测到的变量。依据调查问卷与访谈资料,基于“劳动力→资源依赖性→集体行动”的机制逻辑,选取农户对“农业收入是否为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的问题回应,来代表村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程度。

<sup>①</sup> 因篇幅所限,本文所有中介变量的测量题项不在此具体展示,如有读者需要,可与作者联系。下同。

## 5. 村民间的异质性

基于“劳动力→村民间异质性→集体行动”的机制逻辑,本文选取“村庄集体收入”来衡量村民间的经济异质性程度。村庄集体收入越多,村庄就更有能力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增加投入,从而使所有村民平等地获得发展上的“可行能力”,从而降低村民间的经济异质性(贺雪峰,2015: 1—6)。本文认为,村庄集体收入越多,村民间的经济异质性越小,同质性越好。

表3显示了对本文所选用的潜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的结果。CFA结果显示,本文所选取的观测变量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平均抽取变异(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以及标准化 Cronbach's  $\alpha$  的数值均在可信的区间范围之内,说明各观测变量均能够对潜变量形成良好的解释力度,保证了本研究定量分析结果能够具有良好的可信度。

表3 对潜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潜变量	观测变量	标准化 因子载荷	组合信度 CR	平均抽取变异 AVE	标准化 Cronbach's $\alpha$
领导力	VL1	0.700	0.943	0.559	0.943
	VL2	0.744			
	VL3	0.746			
	VL4	0.729			
	VL5	0.728			
	VL6	0.789			
	VL7	0.810			
	VL8	0.792			
	VL9	0.760			
	VL10	0.722			
	VL11	0.726			
	VL12	0.735			
	VL13	0.729			
信任	SC1	0.757	0.781	0.642	0.774
	SC2	0.834			
关系网络与行为规范	SC3	0.556	0.776 8	0.474	0.768
	SC4	0.793			
	SC5	0.819			
	SC6	0.537			
身份感与奉献感	VS1	0.697	0.834	0.501	0.833
	VS2	0.782			
	VS3	0.726			
	VS4	0.713			
	VS5	0.618			
认同感	VS6	0.733	0.699	0.537	0.699
	VS7	0.733			
社会资本	信任	0.474	0.737	0.612	—
	关系网络与行为规范	1.000			
村庄归属感	身份感与奉献感	1.000	0.789	0.667	—
	认同感	0.577			

注:本文以  $CR > 0.6$ ,  $AVE > 0.5$ ,  $Cronbach's \alpha > 0.6$  作为评判结果是否有效的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衡量关系网络和行为规范的观测变量的 AVE 值只实现了接近 0.5,而未实现大于 0.5 的状态。但鉴于衡量社会资本的两个测量指标(信任、关系网络和行为规范)的 AVE 值达到了

了0.612,我们认为所选择的观测变量能够对社会资本变量形成良好解释。因此本文接受衡量关系网络和行为规范的观测变量的 AVE 值小于0.5 的检验结果。

#### (四) 估计总效应和中介效应过程中所使用的控制变量

在检验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具体机制之前,本文先对劳动力外流对农村集体行动的总效应进行验证。此外,中介变量本身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 SES 框架所包含的影响集体行动的三类因素——自然地理特征、经济社会属性和通用制度规则(苏毅清等,2020:185—197)——来设置本文的控制变量。本文对所选择的观测变量的描述性分析见表4。

表4 各观测变量的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内容/观测指标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b>因变量</b>					
灌溉集体行动	农户参与灌溉设施筹建与修缮的频率, 1 = 不经常参加 - 5 = 经常参加	2.995	1.183	1	5
<b>核心自变量</b>					
劳动力外流程度	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村庄劳动力总数的比例	0.160	0.231	0	1
<b>中介变量中的观测变量</b>					
资源依赖性	农业收入是否为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1 = 是;0 = 否	0.552	0.497	0	1
村民间异质性	连续变量,取对数	0.077	0.567	0	9
<b>总效应中的控制变量</b>					
<b>自然地理特征</b>					
村庄是否位于山区	1 = 是;0 = 否	0.074	0.262	0	1
村庄是否中度缺水	1 = 是;0 = 否	0.397	0.489	0	1
自家耕地距水源的距离	1 = 很近;4 = 很远	2.650	1.194	1	4
<b>经济社会属性</b>					
村集体收入	连续变量,取对数	0.077	0.567	0	9
村庄离县城的距离	连续变量,公里	22.776	17.446	0.1	119
村庄总人口	连续变量,取对数	7.544	0.844	5.075	9.616
村庄总户数	连续变量,取对数	6.286	0.841	3.871	8.519
<b>通用制度规则</b>					
村民对村组织制度设计的评价	1 = 不好;3 = 很好	1.373	0.568	1	3
村庄很少发生用水纠纷	1 = 非常不同意;2 = 比较不同意;3 = 同意; 4 = 比较同意;5 = 非常同意	3.546	1.041	1	5
<b>农户家庭特征</b>					
农户家庭平均劳动能力 <sup>①</sup>	连续变量	0.119	0.181	0.005	1
户均年龄	连续变量,取对数	3.684	0.362	1.846	5.58
户均受教育水平	连续变量	2.645	0.870	0.333	19
<b>其他控制变量</b>					
2016年土地转出面积	连续变量,亩	0.351	1.456	0	50
2016年入地转入面积	连续变量,亩	0.949	15.870	0	550

① 在调查问卷中,农户的家庭成员会填写“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1 = 不参加;2 = 偶尔参加;3 = 经常参加)”的问题。在整理数据时,受访农户每个家庭成员填写的该项目数值相加,再除以其家庭成员总数,得到“农户家庭平均劳动能力”的数值。

### (五) 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构建及其检验

如本文假说所述,劳动力外流可能通过领导力、社会资本、村庄归属感和资源依赖性和村民间异质性五种中间传导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产生影响,进而造成乡村的衰落。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对假说中的各项机制进行验证。由于本研究中所涉及的领导力、社会资本和村庄归属感这三个变量都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潜变量,因此需要借助能够处理潜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来完成对中介效应的估计。图2展示了本文构建的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多重中介效应路径。本文采用 bias correct percentile bootstrap CI 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以此来判断劳动力外流是否会通过领导力、社会资本、村庄归属感、资源依赖性和村民间异质性这五个中介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形成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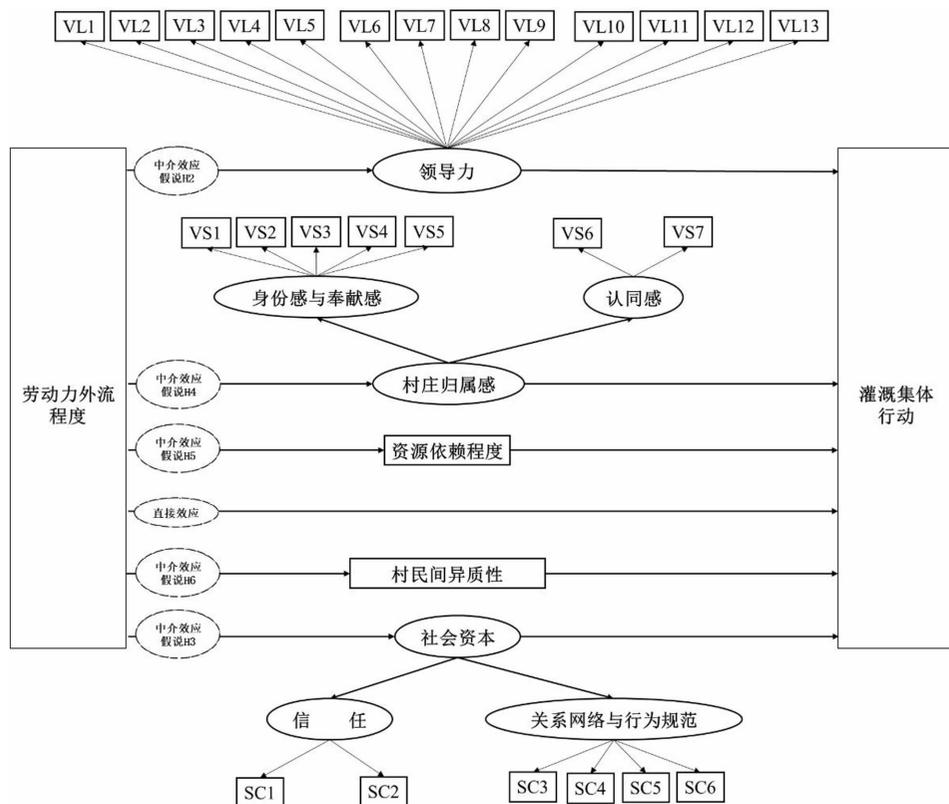


图2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描述的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多重中介效应

## 四、实证分析与讨论

### (一) 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总效应估计

本文首先对劳动力外流对村庄集体行动的总效应进行了检验。表5显示了用于估计总效应的 ordered probit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地区差异,逐步增加控制条件的情况下,劳动力外流对农村集体行动逐渐体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村民所在村庄的劳动力外流程度越高,则该村庄的村民形成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小。假说 H1 由此得证。该结果验证了劳动力外流是导致我国农村集体行动能力普遍衰败的重要原因,因而在总效应层面,支持劳动力外流引发乡村衰落的经验认识。

表5 劳动力外流对村庄集体行动的总效应回归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灌溉集体行动	灌溉集体行动	灌溉集体行动	灌溉集体行动
<b>核心自变量</b>				
劳动力外流程度	-0.039 (-0.51)	-0.128* (-1.67)	-0.191** (-2.46)	-0.191** (-2.44)
<b>通用制度规则</b>				
村民组织制度设计评价		0.340*** (10.97)	0.340*** (10.94)	0.355*** (11.33)
村庄很少发生用水纠纷		0.102*** (5.12)	0.095*** (4.76)	0.095*** (4.76)
<b>经济社会属性</b>				
村集体收入(ln)			0.032 (0.92)	0.036 (1.03)
村庄离县城的距离			0.006*** (5.55)	0.007*** (5.54)
村庄总人口			0.089* (2.08)	0.098* (2.28)
村庄总户数			-0.098* (-2.42)	-0.105** (-2.60)
<b>自然地理特征</b>				
村庄是否位于山区				-0.093 (-1.16)
村庄是否中度缺水				0.111** (2.90)
农户耕地距水源的距离				0.019 (1.22)
<b>农户家庭特征</b>				
农户的平均劳动能力	0.054 (0.60)	0.101 (1.09)	0.097 (1.05)	0.093 (1.00)
户均年龄(ln)	-0.040 (-0.79)	-0.025 (-0.49)	-0.027 (-0.53)	-0.027 (-0.53)
户均受教育水平	0.013 (0.65)	0.0037 (0.20)	0.011 (0.57)	0.015 (0.80)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Observations	3 764	3 764	3 764	3 764
Wald chi2	595.90	772.03	799.02	823.49
Prob > chi2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Pseudo R2	0.053 3	0.066 7	0.070 8	0.071 9

注:\*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

## (二) 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机制分析

在劳动力外流对农村集体行动的负向总效应存在的前提下,我们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揭示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内在机制。本文用于估计多重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度指标 RMSEA = 0.057, GFI = 0.922, AGFI = 0.893, CFI = 0.922, CMIN/DF = 13.402, 说明本文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适配度可以接受。

图3显示了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由MPLUS7.2软件输出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中介路径图。

从结果上看,代表直接效应的 $\hat{\gamma}_1$ 栏对应的所有数值始终为负且并不显著,而代表中介效应的 $\hat{a}_i \cdot \hat{b}_i$ 栏中,领导力、村庄归属感、社会资本和资源依赖性的中介效应均表现出了显著的负向效应。因此,本文对中介效应的估计结果属于完全中介效应。此时,总效应的数值等于各中介效应数值的总和( $\sum \hat{a}_i \cdot \hat{b}_i$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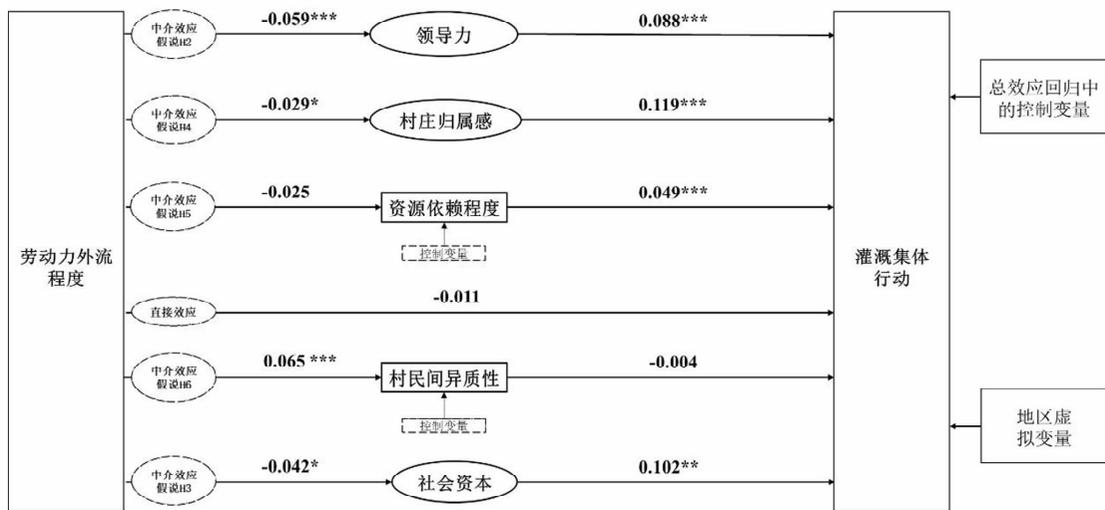


图3 多重中介效应路径图

注:1. \*\*\*, \*\*, \* 表示估计值在99.5%、97.5%和95%的bootstrap bias-correct的置信区间内显著; 2. Bootstrap = 1 000; 3. 各控制变量的路径系数没有在表中给予报告; 4. 控制资源依赖度的控制变量有“村庄是否处于平原和”“近三年本村是否缺水”“村庄劳动力总数”“农户家庭平均劳动能力”“土地转出面积”和“土地转入面积”; 控制村民间异质性的控制变量有:“村庄劳动力总数”“村庄总人口”“村庄总户数”“村庄是否处于平原和”“土地转出面积”“土地转入面积”“村庄离县城的距离”和“农户家庭平均劳动能力”。仅显示主要路径的估计系数。

### 1. 直接效应分析

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在将总效应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后,或者说在排除了中介效应的干扰后,劳动力外流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影响,由显著的负向总效应变为了不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这样的结果,从变量之间更本源的关系层面,证明了劳动力外流并不必然导致乡村衰落。而之前研究中的劳动力外流导致乡村衰落的观点,是在中介机制的负向效应的影响下,所表现出来的受干预的结果。

### 2. 中介效应分析

检验发现,领导力、社会资本、村庄归属感和资源依赖性所在中介机制的中介效应 $\hat{a}_i \cdot \hat{b}_i$ 均在Bootstrapping bias-correct 99.5% CI上显著,进而根据各机制路径的估计系数 $\hat{a}_i$ 和 $\hat{b}_i$ 的方向和显著性可知,劳动力外流具体通过引发——领导力的流失、社会资本的削弱、村民归属感的淡化,以及村民对农业资源依赖性下降——这四种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说H2、H3、H4、H5得到验证。而劳动力外流通过引发村民间异质性程度的增加对农村集体行动产生影响的中介机制未通过统计检验,假说H6未得到证明。进一步观察中介效应的占比可以发现,劳动力外流通过领导力对农村集体行动产生影响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最高,达38.46%,其次为社会资本中介效应,占比为30.77%,村庄归属感和资源依赖性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3.08%和7.69%。

由此可见,劳动力外流与农村集体行动,以及乡村衰落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并不是对立的,劳动力外流本身并不是乡村衰落的直接原因,而劳动力外流所引发的领导力的流失、社会资本的破坏、村民归属感的淡化和村民对农业资源依赖性的下降,才是最终引发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和乡村衰落的真正原因。

##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灌溉集体行动为例,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外流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乡村衰落,现实中观察到的乡村衰落的种种表征,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外流通过抽离村庄领导力、破坏村民间的社会资本、削弱村民的村庄归属感,以及降低农民对农业资源依赖性等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进而累积形成了乡村衰落的后果。劳动力外流对村庄的领导力、村民间的社会资本、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以及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理论上是可以政策调节来缓解甚至扭转的。这就为制定乡村振兴的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农村集体行动的兴衰,必将决定着乡村振兴的成败,并深刻影响国家治理的前途与命运。未来的中国,每年仍将有近千万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农村的人口将从目前的5.1亿进一步减少到2035年的4亿左右,以及2050年的3亿左右,劳动力外流的过程远还没有结束。在此情况下,提升中国农村集体行动能力,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以“干预扭转负面机制,促进加强正面机制”作为政策思路,统筹推进乡村的“五个振兴”。<sup>①</sup> 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政策含义。

首先,加强乡村领导力建设,推进人才振兴。提升村庄的领导力,应作为劳动力外流背景下扭转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的首要路径。目前,国家实施的“第一书记”制度安排,在有效地改变村庄贫困现状的同时,也促进了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和乡村治理水平的显著提升(舒全峰等,2018: 51—65)。此外,各地区还大胆的开展了诸如“企业家村官”“村医村教”进“两委”“乡贤理事会”等治理实践,本质都是对村庄领导力的“反向注入”与补充。未来在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提升村庄领导力的核心任务是探索实践新型的领导力结构,以使得自上而下的党政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能够在村庄实现有机融合。

其次,发展繁荣乡村文化,推进文化振兴。增进村民社会资本的积累,必须加强农村的社会文化建设。乡村文化的繁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任务,在短期内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应注重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期以传统农耕文化的继承和农民精神风貌的提升为重点;在长期注重将乡村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治理纳入到乡村文化的建设当中,形成人文文化、自然文化与社会文化的良性互动,使乡村实现从物质振兴到精神振兴的方向发展,以此来推动乡村的文化振兴,恢复乡村的社会资本积累,由此振兴农村的集体行动。

再次,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进组织振兴。一直以来,传统单家独户的分散经营模式所形成的只“分”不“统”的生产、组织以及治理观念,使得村集体成员对于村集体的观念不断丧失,进一步导致了人们对村庄归属感的下降。目前全国多地依据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分类推进的原则进行探索。江苏省、贵州省、四川省等地试行的“三变”改革,山东省、安徽省、江苏省等地探索出的村集体领办、联耕联种等新型经营体制,走出了“三权分置”制度框架下的“统分结合”新路径。这些尝试强化了农民在村集体中的身份意识、主体意识,增强了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相关经验值得总结推广。

第四,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推进产业振兴。提升村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应着力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在宏观层面继续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在产业层面不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保障粮食安全、优化农业结构、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

<sup>①</sup>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深刻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即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

营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并根据不同地区农村的特点,结合村庄具体的资源禀赋来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提升农民对于农业资源的依赖性,进而增进农村集体行动。

第五,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推进生态振兴。克服劳动力外流对农村集体行动和乡村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大力推进劳动力的城乡互动,积极引导劳动力向农村反向回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乡村相对于城市而言,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拥有山、水、林、田、湖、草所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因此应持续推进改善乡村村容环境、生态环境的公共政策,努力发挥乡村的功能和优势,吸引更多劳动力主动回流,从而促进农村集体行动的复兴。与此同时,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增强也将对乡村的生态振兴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本文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全球很多国家在现代化和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都面临着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而伴随的乡村衰落问题。本文研究揭示,劳动力外流并不必然导致乡村衰落,关键是能否做出恰当的政策响应,来缓解甚至扭转劳动力外流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统筹推进“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提供了理论阐释,可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启示和政策参考。

### 参考文献:

- [1]贺雪峰,2015,《论中坚农民》,《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第4期,第1—6页。
- [2]詹姆斯·库泽斯、巴里·波斯纳,2007,《领导力》(第3版),李丽林、杨振东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 [3]舒全峰、苏毅清、张明慧、王亚华,2018,《第一书记、公共领导力与村庄集体行动——基于CIRS“百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第3期,第51—65页。
- [4]苏毅清、秦明、王亚华,2020,《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影响——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的研究》,《管理世界》第7期,第185—197页。
- [5]王亚华、高瑞、孟庆国,2016,《中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危机与响应》,《清华大学学报》第2期,第23—30页。
- [6]叶兴庆,2018,《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改革》第1期,第65—73页。
- [7]朱启臻,2018,《当前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3期,第21—27页。
- [8]Adhikari, Bhim and Lovett, Jon C., 2006, Institutions and Collective Action: Does Heterogeneity Matter in Community-based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2(3), pp. 426 – 445.
- [9]Araral, E. and Ostrom, E., 2014, Hardin and the Commons: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and A Revisionist View,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36(3), pp. 11 – 23.
- [10]Bardhan, P., 2001, Distributive Conflic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Frontier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Future in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1]Bardhan, P. 1993, Symposium on Management of Local Comm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4), pp. 87 – 92.
- [12]Chavis, D. M. and Abraham, W., 1990, Sense of Community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A Catalyst for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8(1), pp. 55 – 81.
- [13]Cicognani, Elvira, Pirini Claudia, Keyes Corey, Joshanloo Mohsen, Rostami Reza and Nosratabadi Masoud, 2008, Social Participation, Sense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Well Being: A Study on American, Italian and Iranian University Studen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9(1), pp. 97 – 112.
- [14]Cox, M., 2014, Modern Disturbances to A Long-lasting Community-based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The Taos Valley Acequia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4), pp. 213 – 222.
- [15]Easter, K. W. and Palanisami K., 1986, Tank Irrigation in India: An Example of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Management,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Manage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16]Fujiie, M., Hayami, Y. and Kikuchi, M., 2005, The Conditions of Collective Action for Local Commons Management: the Case of Irrig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Agricultural Economics*, 33(2), pp. 179 – 189.

- [17] Janssen, M. A. and Anderies, J. M. , 2013, A Multi-method Approach to Study Robustness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the Case of Small-scale Irrigation System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9(4) , pp. 427 – 447.
- [18] Kasarda, J. D. and Janowitz, M. , 1974,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3) , pp. 328 – 339.
- [19] Klandermans, B. , 2014, How Group Identification Helps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5(4) , pp. 887 – 900.
- [20] Kolavalli, S. , 1995, Joint Forest Management: Superior Property Rights?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30(30) , pp. 1933 – 1938.
- [21] Li, H. and Li, M. , 2011, Collective Water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Rice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44(44) , pp. 391 – 405.
- [22] Liu, Yansui, and Y. Li. , 2018,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Nature*, 548(7667) , pp. 275 – 277.
- [23] Mannarini, T. and Fedi, A. , 2009, Multiple Senses of Community: The Experience and Meaning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7(2) , pp. 211 – 227.
- [24] McGinnis, M. D. Ostrom E. , 2014,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Framework: Initial Changes and Continuing Challenges, *Ecology & Society*, 19(2) , p. 33.
- [25] Meinzen-Dick, R. , 2007, Beyond Panaceas in Water Institu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4(39) , pp. 15200 – 15205.
- [26] Meinzen-Dick, R. , Raju, K. V. and Gulati, A. , 2002, What Affects Organiz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for Managing Resources? Evidence from Canal Irrigation Systems in India, *World Development*, 30(4) , pp. 649 – 666.
- [27] Olson, M. , 2017,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8] Ostrom, E. and Gardner, R. , 1993, Coping with Asymmetries in the Commons: Self-Governing Irrigation Systems Can Work,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4) , pp. 93 – 112.
- [29] Ostrom, E. , 1999, Revisiting the Commons: Local Lessons, Global Challenges, *Science*, 284(5412) , pp. 278 – 282.
- [30] Ostrom, E. , 2007, A Diagnostic Approach for Going Beyond Panacea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4(39) , pp. 15181 – 15187.
- [31] Ostrom, E. , 2009,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cience*, 325(5939) , pp. 419 – 422.
- [32] Ostrom, E. ,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3] Ostrom, E. , 2000, Social Capital: A Fad or A Fundamental Concept, *P. Dasgupta & I. Serageldin: Social Capital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pp. 172 – 213.
- [34] Pretty, J. , 2003,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Science*, 302(5652) , p. 1912.
- [35] Putnam, R. D. , Leonardi, R. and Nonetti, R. Y. , 1994,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36] Stern, P. C. , Dietz, T. and Ostrom, E. , 2005, Perspective: Research on the Commons: Lessons for Environmental Resource Managers, *Environmental Practice*, 4(2) , pp. 336 – 346.
- [37] Stiglitz, J. E. , 2012,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38] Wang, Y, Chen, C and Araral, E. , 2016, The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mmon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88) , pp. 79 – 93.